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激進年代學者的中國研究—馬恩樂、馬克林、范乃思、王海、李歐梵

China Scholars of the Radical Years-Meisner, Mackerras, Van Ness, Heberer, and Lee

doi:10.30390/ISC.201109_50(3).0001

問題與研究, 50(3), 2011

Issues & Studies, 50(3), 2011

作者/Author：石之瑜(Chih-Yu Shih);廖國智(Kuo-Chih Liao);許韋婷(Wei-Tin Hsu);張毓純(Yu-Chun Chang);洪雅筠(Ya-Yun Hung);黃有彤(You-Tung Huang)

頁數/Page：1-2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109_50\(3\).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109_50(3).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激進年代學者的中國研究

——馬思樂、馬克林、范乃思、 王海、李歐梵

石之瑜、廖國智、許韋婷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張毓純、洪雅筠、黃有彤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摘要

激進年代學者指 1960 年代成長，而今已為耆老的知識分子。1960 年代適逢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美國與歐洲同時爆發學潮，影響了一代學者的養成，其中不乏後來成為中國研究的專家，散布各地。本文選擇性的比較不同背景的激進年代學者，包括從捍衛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到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美國學者馬思樂 (Maurice Meisner：馬克思主義)、在文革前已蒞臨中國從戲曲研究轉為少數民族研究的澳洲學者馬克林 (Colin Mackerras：戲曲與少數民族)、從借用中國反抗美國帝國主義到全面反對政治壓迫的美國學者范乃思 (Peter Van Ness：外交與人權)、從熱衷毛澤東主義到發掘基層民族企業家能動性的德國學者王海 (Thomas Heberer：少數民族與地方經濟) 與從找尋邊緣位置到定位於世界主義的華裔學者李歐梵 (Leo Lee：文學)。他們共同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但後來基於各自的社會遭遇與思想成長，開展出各具特色的中國研究。本文歸納發現他們研究中國的時間與地點影響到他們如何調整研究策略。

關鍵詞：馬思樂、馬克林、范乃思、王海、李歐梵

* * *

壹、前言

六〇年代中期到越戰結束，世界爆發學潮，堪稱激進年代。對中國文化大革命有

憧憬的這一代人後來有的成爲中國通，其中反映了當代人對他們自身所處社會的批判，並將理想投射到毛澤東發動的革命。但也因爲曾經嚮往，以至於當後來對中國的發展實況有更多的認識後，因爲革命理想破滅而失望的大有人在。這一代在激進年代成長的學者之間出現的差異，在於他們如何回應中國革命激情的式微。^①對激進年代學者的回顧，有助於認識中國研究者如何受到他們對所處時空的態度所影響，以及如何受到中國自身的發展所影響。這其中有三項變數，一是他們進入中國研究的時間，是否已經具備某種外於中國的研究主體，亦即他們是否透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汲取他們最初的研究視角；二是他們在自己所處的空間，是否直接身處於面對帝國主義的國度即美國，^②亦即他們對中國的研究是否影射他們反抗帝國主義的責任；三是當中國擺脫文化大革命而採取改革開放後，他們的研究立場是否或如何調整？本文以下將透過對五位學者學思歷程的整理，探究前兩項變數是否影響第三項變數。

表 1 激進年代學者在改革開放後面對中國的態度

空間 \ 時間	文革前已具主體	文革中建立主體
身在帝國之內	放棄中國模式 馬克思主義	批判中國悖離 反帝國主義
身在帝國之外	觀察中國變化 整體中國	開發中國動能 個體中國

倘若學者在文革前已經具備外於中國的研究主體性，文化大革命的終結比較不會影響研究角度，但是他們當中身在美國之內反帝的學者，就不能繼續借用中國來彰顯反帝的信念，這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爲例（表 1 左上），本文選擇以馬思樂（Maurice Meisner）爲代表；而身在美國之外的學者本就沒有立即反帝的急切需要，便可以保持相對超然的心態觀察中國整體的變化（表 1 左下），本文選擇以馬克林（Colin Mackerras）爲代表。在文革中才開始經由毛澤東認識中國，並從毛澤東思想汲取革命觀點，對美國帝國主義進行批判的激進年代學者，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後，可能產生遭到背叛的感情，並因此而將中國視爲與美國共謀的對象，對之展開批判，這可以反帝的 CCAS（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學者爲例（表 1 右上），本文選擇范乃思（Peter Van Ness）爲代表；他們之中也可能因爲不在帝國之內，因此而願意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另起爐灶，追蹤各種不受掌握的能动性，延續某種對解放的憧憬，進而上窮碧落下黃泉開發個體能动性之潛能（表 1 右下），本文選擇王海爲代表（Thomas Heberer）。最後，本文選擇華裔學者李歐梵（Leo Lee）作爲比較，因其既身在美國、又身在中國，既在文革前已有研究主體性、在文革中又產生不同的研究主

註① Allen Douglas, "Antiwar Asian Scholars and Vietnam/Indochina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1 (1989), pp. 112-131.

註② 激進年代學者基本上均視美國爲帝國主義，本文對象中的馬克林則沒有這樣的預設，但本文以下仍採納以美國爲帝國主義的話語，以符合激進世代之所以號稱激進而對美國採取的批判角度。

體性。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對馬克林與王海主要是仰賴訪談，對馬思樂則仰賴文本與文獻，對范乃思與李歐梵是兩者兼用。

貳、馬思樂的學思歷程與中國研究

馬思樂 (Maurice Meisner) 1931 年出生於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研究生涯自始服膺馬克思主義。1960-1962 年獲取福特基金會外國地域訓練研究生獎學金，並於 1962 年取得博士學位，在文革與反戰學潮之前，即已建立自身穩定的研究主體性。馬思樂的著作範圍包含了整個現代中國的歷史。他於 1964 年發表的第一本著作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奠定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基礎。在狂熱的文化大革命氣氛中，他著重於研究革命者如何連結過去與現在，並於 1982 年出版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詳盡分析毛澤東思想。而 1986 年出版的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1996 年出版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不懈地追問中國模式對馬克思主義的意義。^③

馬思樂分析中國的主要視角，在於革命者的主觀目標與其所處的客觀條件之間的矛盾。馬思樂總是帶著同情的角度分析毛澤東思想，指出毛澤東的「空想」雖違背正統馬列主義，但卻是改造馬克思主義以符合中國歷史環境必然的結果。馬思樂理解毛澤東所發動的，是有別於蘇聯的一場真正結合群眾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且建國成功後，繼續體現在毛澤東的烏托邦政策中，以致毛澤東能夠不斷以某種民粹主義的形式回到群眾身邊，最後發動文化大革命打擊逐漸腐化的官僚體制。

馬思樂認為，儘管馬克思本人對於烏托邦主義多有批評，但事實上他僅是批評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過於強調人類的意志，忽略現代歷史的作用，因而馬思樂認為馬克思「並未克服烏托邦的二重性，即作為應然之物的道德理想和現實事物的歷史必然規律之間的對抗」。但毛澤東已能在思想上不斷意識到現狀的不完美，因此才進而開展不斷改造現狀的動力。^④故毛澤東繼承並改造了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思想，將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主義聯繫起來。

然而，馬思樂又根據馬克思主義，指出中國於革命當時並不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物質和社會條件，因此，中國革命的結果將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馬思樂認為在 1980 年代中期後，這樣的結果一覽無遺，儘管中國官方不斷試圖論證他們的政策是符合社會主義的，但始終無法有效地掩蓋中國經濟的資本主義特徵。不過，馬思

註③ 蕭延中、張慧才，「附錄 4」，「傳說」中的傳說（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 年），頁 483-484。

註④ Maurice Meisner 著，張寧、陳銘康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26。

樂相信毛澤東思想並未失敗，因為如果沒有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中國無法在飽受外國侵略與軍閥混戰後，快速地在這樣廣大的領土上實現民族獨立和政治統一。^⑤

每當有新資料出現時，就會威脅到馬思樂原本的解釋，對於他這樣一個嚴肅的批判家與歷史學家而言，是一段相當痛苦的歷程。例如他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表現，即從一開始在第一版謹慎地指出中國經濟體制不像傳統的資本主義，到第三版直接失望地指出中國共產黨是資本主義的主要推動者。稍早，他筆下毛澤東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失其理想性，但到出版 *Mao Z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 時，則在保留毛澤東理想面的同時，新增了專斷面。

然而，馬思樂對於毛澤東思想卻有著不變的堅持。首先，他特別強調毛澤東思想與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相似性，反覆陳述毛澤東蔑視社會主義以資本主義為前提的邏輯，毛澤東不以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主力以及毛澤東認為主觀可以改變客觀的三個主要命題。^⑥其次，馬思樂雖然高度評價中國革命，以及革命後社會變革之偉大，但仍根據中國共產黨同農民的高度連結，將其定義為農民政黨，而不代表無產階級，故他指1949年革命為農民革命而非社會主義革命。最後，馬思樂雖然理解毛澤東以「唯意志論」的思想取代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於客觀環境的強調，以克服中國落後的環境與社會主義理想之間的矛盾，故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有所悖離，不過馬思樂將此評價為延續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而有意義的嘗試。馬思樂給予毛澤東的評價，因而超過中國共產黨。難怪對後毛時期的中國，馬思樂的失望溢於言表。

馬思樂詳細考據鄧小平理論，承認資本主義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基礎的重要性，試圖相信甚鄧小平借用看似資本主義的手段，是在為完成社會主義服務，但對於逐漸反客為主的資本主義在中國蓬勃發展，手段與目標巨大的分裂，而不願給予後鄧中國好的評價。馬思樂承認中國高度且驚人的經濟發展，但看到經濟改革所造成的高度不平等以及官僚體制作為資本主義的主要推手，未知能否期望未來中國能實現「社會主義以及作為其本質的民主先決條件」。^⑦

馬思樂本著對馬克思主義的特殊理解，包括強調資本主義的重要性、以無產階級作為生產資料所有人並且參與生產計畫的社會主義式民主，以及相對地對官僚組織的排斥，使得他在詮釋中國共產主義時，遭到同為左派的陣營所攻擊。同時也因為馬思樂的研究有別於改革開放的主流觀點，故不見容於中國國內的改革學者，多數批判都注意到他對烏托邦主義、民粹主義與唯意志論的相關研究。^⑧

註⑤ Maurice Meisner 著，杜詩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V-Xii。

註⑥ Meisner Maurice 著，張寧、陳銘康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88。

註⑦ Meisner Maurice 著，張寧、陳銘康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註⑧ Nick Knight, "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 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Canberra: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7-22.

在烏托邦社會主義的部分，其他學者批評馬思樂不能設身處地的在中國的立場，去注意毛澤東與中國的革命者面對中國特殊的情勢，必須加快工業化與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因而才有大躍進等政策的出現。在民粹主義的部分，其他學者批評馬思樂過於誇大毛澤東、中國共產黨與農民之間的連結性，而未能將毛澤東是在堅持無產階級領導的前提下，引進農民的革命力量之創舉，亦漠視了毛澤東思想中傳統中國的「民本」思想根源。在唯意志論的部分，其他學者亦再次批評指出，晚年的毛澤東雖然犯了唯意志論的錯誤，而指導了為中國帶來許多創傷的文化大革命，然而這不過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

然而，馬思樂在其著作中有詳盡研究毛澤東所進行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政策。對於文化大革命時代以前的毛澤東，馬思樂亦有考察到其他非唯意志論的思想，只是對馬思樂而言，到了文革時，毛澤東已轉變為唯意志論者。而關於毛澤東對於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態度，馬思樂亦注意到「堅持無產階級領導」的宣傳，只是馬思樂更注意共產黨大多是由農民組成，主要幹部亦多農民出身以及無產階級對於共產黨的影響力相當薄弱的實際狀況。

無論馬思樂的定位是一個中國研究者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從他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他對於馬克思主義有其獨特的理解和詮釋。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與其說他們批評馬思樂的中國研究，不如說是批評馬思樂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及對馬克思主義所帶來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學者不是出於對中國的關注，而是針對馬思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詮釋有所爭辯；相對於此，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擅於賦予馬克思主義新詮釋，以馬克思主義之名提供中國當下所選發展路徑的正當性。

馬思樂所認識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對其時代背景的反應，那是對經濟決定論的否定，並且批判了按照經濟發展來理解社會主義的傾向。他同意高度的物質文明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因此無論就歷史環境或是理論內涵而言，馬克思主義都應該是不斷變動的理論體系。馬思樂指出，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批判的關鍵假設是，人類的本質為生產者而非消費者，且人就是透過生產這樣創造性的工作，不僅感受到愉悅，亦實現了人類的潛能。資本主義就是因為採取非自然且非人道的作法剝奪了生產者勞動的成果，以及生產的滿足感，造成了人的異化，因而受到馬克思的批判。由此可見，「馬克思最初反對資本主義的理論，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的和倫理的批判，而非經濟的批判。」^①

馬思樂從這樣的認識出發，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應重視社會怎樣組織和實施生產，而不是以生產多少來思考和評估社會主義，尤其是實踐上已被放棄的勞動者自我管理，應是關注焦點，則不應視勞動為商品，以及以經濟效益為名倡導分工。故與其將馬克思主義當成經濟批判，不如當作社會批判，則可避免馬克思主義和其它的社會

註① Maurice Meisner 著，俞可平譯，「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193-202。

主義理論為一種「最粗俗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現代化』理論」。¹⁰既然馬思樂主張一種具人道關懷的馬克思主義，自然對於毛澤東運用或改變人的意志以作為邁向社會主義的途徑，既承認為突破，也有所保留。馬思樂對於馬克思主義隨歷史環境有所變動的主張是有界限的，特別是將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社會主義手段，已與社會主義目標本身產生矛盾的看法，這點受到中國學者的排斥。

對於中國的學者而言，建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目的，似乎是尋找挽救中國的工具。而與馬思樂辯論的美國左派學者無疑是失落的一群，他們似乎想要透過釐清中國的社會主義來尋找如何挽救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只是有的人藉由浪漫化中國的社會主義來尋求寄託，有的人則是藉由批判中國的社會主義來說明馬克思的理論從未被真正實踐過，因此也不該為任何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負責。馬思樂不替中國辯護，也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而致力於延續某種他認為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他對中國的認識因而是別有作用的。

參、馬克林的學思歷程與中國研究

在文革前即已到中國教書的馬克林，1939年在雪梨出生於澳洲二十世紀成就卓越的世家 Mackerras 家族，他自己這代也是一門豪傑，兄長與他均獲頒國家勳章。他在1962年於澳洲國立大學取得文學士學位，1964年取得劍橋碩士學位，1970年取得澳洲國立大學博士學位，長年用心於研究、教學與社區服務，如中文教學廣播節目。馬克林精通中文亦可閱讀德文與法文，主要研究專長為亞洲音樂與戲劇（尤其是京戲）、中國近代歷史、政治與社會發展、中國少數民族、國際關係（主要為中國、越南與澳洲）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北韓與越南）。馬克林大學畢業的70年代，正是澳洲中國學研究開始蓬勃發展的年代，三十多年來，馬克林見證並參與了澳洲中國學的發展歷程。

馬克林1964年首次到中國，回憶時述而不作，避免評價。他憶及應徵兩年期英文教師當時，面試者詢問他「是否介意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而馬克林則反問兩個問題——「我的孩子即將出生」與「我是天主教徒」。馬克林雖然結交了許多中國好友，但也感受到部分居民排斥外國人，尤其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感受更深。馬克林觀察到中國大家庭生活，過去很難想像祖父母、表兄弟姊妹同住的情形，也觀察到婚姻多由父母決定，女性相較西方樸素，出門少化妝打扮，行為舉止受到傳統「女子應有的禮儀」所規範，因為經濟因素，婚後許多婦女仍持續工作，不變的是母親的地位受到重視，長輩受到尊敬。他肯定家庭在中國社會結構是十分重要的組成。

在教育方面，馬克林觀察到中國不形塑菁英，提倡工農的社會地位，教育採用「灌輸式」，雖然講課者觸及多元觀點，但最後仍引導成「反對美蘇」。另一方面，學

校鼓勵學生批判老師，令他震撼的是政治思想教育，馬克林所接觸到的學生，多認為努力不但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國家的未來。當時，進入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入學條件是正確的意識形態、語言天分及健康體能，學生的家庭背景在文革之前各種階層都有，在文革後多來自中產階級，他發現所有學生的共同點是充滿了熱情。平時馬克林也以「同志」稱呼學生。在上課時，教室後面時常會有共產黨員，監視老師是否傳授不利於黨的思想，尤其是在 1965 年 2 月開始規定，英文課教材必須包括毛澤東思想。他看到學生畢業後的工作任用，大多藉由推薦介紹。文化大革命時，許多學校停課，然而馬克林卻發現很多老師與學生樂於其中，而他們外語師資雖然停課，但未因此解聘。

他發現中國學生少有隱私權的觀念，學生會向老師請教私人事務，請求老師給予建議，馬克林覺得這對西方人來說不可思議的。中國學生總認為自己過的生活優於西方學生，不時產生自大心態，許多中國人認為沒有任何國家比中國的生活好，甚至不少人相信他一定會想永留中國。毛澤東曾說要將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分開來討論，中國人民應討厭美國政府而不是美國人民，許多學生深信這項觀點，曾告訴馬克林他們學習英文的目的是希望能與美國士兵溝通，告訴他們敵人應該是美國的公司老闆，而不是我們「階級兄弟」。報紙少有國際新聞，出現的可能只會是對不認同中國路線之國家進行醜化，或是早已不是「新」聞的事件。馬克林從學生的作文中得知學生的世界視野十分參差不齊，多數缺乏以較客觀的方式認識世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最為嚴重。

馬克林的中國研究議程有其自身發展過程，他因為從歷史學系畢業與對音樂的興趣與素養，使得馬克林在研究中國歷史必定提及該時代的戲劇發展，在戲劇研究中，也無不論述戲劇發展如何受到該時代的政治社會環境所影響。又少數民族特有的表演藝術以及歷史上對中原王朝的影響，使得馬克林從戲劇與歷史面向來勾勒中國時無法忽略，研究題材之趨勢逐漸延伸到少數民族表演藝術，進而涉獵對少數民族事務的研究，也是 1990 年代後馬克林的研究轉向在少數民族議題上著墨甚多之因。

馬克林在中國戲劇研究上以傳統戲劇為主，但少數民族的表演藝術也多所涉獵，並且將戲劇與政治社會環境結合討論觀察其發展，並使用田野調查法至各地觀賞地方戲劇，在面對傳統戲劇的創新時，雖然自己喜歡傳統樣貌，但他認為亦應保留空間給創新者發揮的空間，他在傳統與創新兩者之間持一中立態度，而傳統文化並非得一成不變才有價值。在歷史研究上，可分為傳統中國與當代中國，強調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的轉型與變遷，寫作時力求面面俱足，不蓋棺論定歷史人物的對錯成敗，且隨「中國崛起」澳洲應加強對中國研究與教學的重視，也因此寫作形態不乏深入淺出的教科書、以青年學子為寫作對象。

馬克林藉由親身參訪少數民族聚居地，觀察中國少數民族現況。在中國少數民族著作中，因其主要田野地在西藏和新疆，故在作品中對藏、維二族的描述最多，除維吾爾族會深入探討其民族歷史外，其他族多在民族史上僅簡要介紹背景，多著墨於當

代現況，探討現代化對少數民族社會結構帶來的衝擊，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文學藝術以及國際關係皆有涉獵，以及深入研究少數民族在現代化下的認同問題，到底「我們是誰？」面對強勢的漢文化，哪些傳統文化應該堅持哪些只好捨棄？這是心理與社會問題，而且不僅只牽涉個人，尚牽連到部落，甚至於整個民族。

相較於美國的學術環境，澳洲中國學研究的特色之一是學科本位不強。從馬克林的研究領域內容來看，頗可呼應這項對澳洲中國研究特色的觀察，而馬克林在訪談中也意識到此現象，他對中國相關之議題皆有涉略，雖各領域研究成果多寡不一，早期以傳統戲劇和歷史為主，後以少數民族為主，但可以明顯發現「中國」就是馬克林的研究客體，而不是爲了要驗證某個學科理論，同時，除了自己鑽研外，也由於澳洲與中國關係日益密切，呼籲澳洲社會大眾應對中國文化與語言有基本認識。

分析馬克林的少數民族研究的不同面向，一是述而不作，傳達當事人的立場，避免給予評價，隱喻某種凡是存在必有道理的態度，進而看到致力於鼓吹「民族平等」的中國，在生活研究中發現的是「既傳統又現代」的中國，在認同研究中知悉少數民族對國家穩定與否占有關鍵地位。並陳的結果是，少數民族認同與國家整合是可以同時並行，少數民族爲國家整體中之「個體」。他注重文化的變遷，並同時關心傳統與當代，因此在寫作時，皆是先書寫各項議題的源流、少數民族傳統習俗，再提及當代的改變以及現況中面臨的問題與可能解決之道。他對現代化抱持中立態度，不專斷評論現代化對傳統的打擊，傳統文化可以改變，只要能從改變後的結果看見傳統的影子，便是文化的延續傳承。

據此，馬克林認爲少數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可以同時維護，整體中之個體仍能保有主體，只要政府極力促進民族平等，提升少數民族社會經濟地位，減少其生活水準上與漢族的差距，衝突摩擦便會減少，少數民族會安於現狀，無須抗爭獨立成爲「民族國家」。這樣的出發點，體現澳洲中國學研究的類似「國協意識」的認識方法，亦即將中國看成是各有主體性的個體組成的整體，只要政府與漢族能在政策上與實際行爲上尊重少數民族，56個民族可以共存於整體之中。

馬克林的藏族現況與分離運動研究，針對現況，馬克林提及了民族間、地區間發展不均以及勞工雇用問題有待解決，而引起國際關注的關鍵爲獨立運動與人權壓制問題。獨立運動的背景，馬克林從歷史談起，至近代趨於國際化，除了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宣傳外，馬克林訴諸國際對人權的關注，他認爲中共確實需加以解決。然而即便有種種問題，馬克林預估至少未來十年西藏仍會屬於中國，因爲經濟發展會使少數民族對政府增加好感，當局也未如達賴喇嘛的指控，做出打壓藏族文化的舉動，而是在政治上的控制。在馬克林的西藏研究中可以觀察到，他對分離運動並不看好，反而當前情勢是有利於中共維持國家穩定統一，且中央政府若能穩固西藏局勢，中國之國力勢必更加強盛，馬克林預見的是一個未來無可限量的中國。

在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研究方法上，馬克林多使用田野調查法，著重少數民族間的比較、觀察綜覽少數民族發展趨勢，凸顯各族的「個體性」，是他研究中國少數民族

時的重點之一。馬克林對於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可說是將少數民族放入「中國」一個整體中來觀察，尤其是在著作中少以「一個民族」作為研究主題，或將某一民族作特別田野地點，將該民族自古貫今透徹地研究，而是多以一項「議題」，例如性別、經濟等作為主題作為切入點，來觀察各少數民族的情況。在 55 個少數民族中，馬克林也有花較多篇幅研究的民族—藏族與維吾爾族，這與他進入少數民族研究的起點是回鶻對中原帶來的挑戰，可謂一脈相承，適逢此二族分離或獨立主義運動高漲，涉及國家整體性的維持，因而馬克林對於這兩族研究較多。

馬克林不認為現代化就不好，他看到是維吾爾族在現代化刺激下，雖部分年輕人熱衷西方主流文化，然而部分族人反而以傳統音樂作為民族凝聚工具，使文化延續。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是現代化與全球化，這才是馬克林認為傳統文化受衝擊的來源，而非源自漢族的壓迫，但馬克林認為當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結合成為少數民族新的文化時，外界應該樂見，因為活的文化本來就會變遷，不應該有「文化永恆」的追求。他不支持新疆與西藏獨立，且認為中共有權利遏止國內的分離運動，實踐中國作為一多元民族國家。在馬克林的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少數民族在這些政策中受到何種改變與影響，是馬克林所關心的。中共的主要政策方向是推動多方優惠政策來提升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與生活水準，亦提倡尊重各族傳統文化。雖然少數民族仍面臨諸多問題，但從他的訪查研究中得出，少數民族的生活水準受優惠政策的施行影響大致上是成功的。

在傳統戲劇研究中，除討論傳統上有戲劇發展的少數民族外，馬克林亦綜覽各族其他方面的傳統藝術，例如說唱與舞蹈，少數民族表演藝術也可根據時代背景分為各族傳統曲目，中共建政後成立民族歌舞團、出現政治表演曲目以及各族表演藝術受漢族影響程度不一的特色，由此可以發現馬克林已意識到中國為一多民族國家，欲研究中國的戲劇與表演，少數民族文化不容忽視。在歷史研究中，馬克林中國歷史與戲劇研究的舞台上，看見的不單只是漢族的獨角戲，尚有少數民族「個體」共同出演，常談到其與「中原王朝」的互動交流，而這些交流動輒可以影響中原王朝的存亡，可見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上之重要性。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本為兩個矛盾的概念，但在馬克林的觀點中，將少數民族個體置於中國整體中來看，近來除了藏族與維吾爾族外，大多可以做到既有本族認同亦有國家認同。馬克林不支持二族與中國分離，亦不認為中共當局會給二族分離的機會。少數民族是中國「整體」中之「個體」，只要政府能平等對待少數民族、尊重少數民族不同文化，各族可在「國家整體」的概念中認同本族、延續其自身文化。他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可說是一脈與他自身早期中國歷史與戲劇研究有所貫串，他「強調歷史脈絡與社會環境對當時現況的影響」，在觀察各事件時往往引入歷史因素作為分析背景。他「認為少數民族文化必須延續但不必永恆不變」。

馬克林自 1960 年代首次抵達中國時，看到的是一貧窮、封閉、守舊的社會，然卻蘊含豐富文化。到 1980 年代再訪中國時，看到的是一變遷快速的中國，是一既傳統又

現代的風貌。在變化中，馬克林能在著作中盡量站在同情角度看待每一事件，並且合理化其他研究者的不同觀點，避免論斷批判，因為他認為每個研究者都有其背後思考脈絡可循。不論是在歷史、戲劇或少數民族研究上，重視研各研究者不同的意見表達權利，也是馬克林中國研究中的一貫特色，因為馬克林認為每個研究者的論點都是在其所處社會環境脈絡下所產生，必有歸因可循，因此他在寫作時「力求平衡」，他少以嚴厲的言詞批判任何觀點，在與其他學者對話時，如遇「極端意見」，馬克林只會加註個人的見解，使各方意見合理化。

肆、范乃思的學思經歷與中國研究

范乃思自幼在無拘束的牧場成長，養成對強權與干預的排斥性格。他畢業於 Williams College 的政治學系，曾調赴韓戰與中國為敵。1957 年來到香港，因身為美國人無法進入中國反而對中國感到極高興趣。之後他前往「安靜古老的西式貿易港口」澳門：「…港口內到處是懸掛中共國旗的船隻，我花了很多時間細細摸索，想像中國到底是什麼。」¹¹結束旅程後的他，下定決心要研究中國。回憶在柏克萊就學之時，他特別感念受麥卡錫主義之害的謝偉思讓他獲益良多。范乃思在越戰期間歷經思想轉變，排斥對中國的主流看法，而視美國為帝國主義。他將行使正義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因為自毛澤東建國，中國外交論述核心就是打倒美帝。毛澤東思想深刻吸引他，他希望中國透過世界革命，為世界帶來進步。

他在韓戰二十年後回溯，中國對外國領土不感興趣，參戰乃出於自衛，在韓戰結束後也沒有藉機控制北韓，因此難稱擴張主義國家。¹²范乃思並以毛澤東思想檢視中國，認為中國謹守毛澤東關於自力更生的指示，並沒有直接干預各國革命活動。¹³他解釋中國並非擴張主義國家的原因，除了物質有限、軍力未及外，更重視毛澤東思想的作用。他指出西方學者以共產主義為敵，在分析中國時受限於自身意識形態，往往會忽略所謂「邪惡」的敵人實有其自身道德準則，¹⁴與西方學者大異其趣。準此，范乃思指出中國不以武力為達成世界革命的適當作法。資源、權力、安全和中共意識形態是范乃思早期理解中共決策的主要因素。

范乃思以研究文化大革命成名：

註 11 Peter Van Ness, "Peter Van Ness Interview," 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網站訪談稿 (October, 19-20, 2009), <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02.php>, 頁 6。

註 12 Peter Van Ness, "Mao Tse-tung and Revolutionary Self-Relianc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0 (January/April, 1971), p. 70.

註 13 *Ibid.*, p. 71.

註 14 *Ibid.*, p. 73.

文化大革命並不如很多學者詮釋的那般，僅僅是單純是權力的鬥爭；文革同時也是一場爲了達成毛澤東思想概念中的好社會，所進行的鬥爭。而如果想要成功的話，運用由下層進行革命這樣的方法被認爲是不可或缺的…。文革的目標是攻擊過去中國的生活方式，其中包含官僚主義、物質主義、自私自利、菁英團體統治…主要特徵。因此，清洗的目標主要針對那些帶來這種發展的領導者。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的意圖是透過由下而上的改變，針對所有的社會制度，清洗整個社會體系。¹⁵

隨著文革內幕逐漸的被公開，范乃思承認道：

有趣的是因爲我們採取了文革中毛澤東思想的主要概念，並實行在我們的社會上……我們認爲這些概念可能對改革我們社會有相當大的助益，但這卻導致了我們對於中國情勢和恐怖情勢的更深誤解……攻擊權威變成攻擊所有事物……許多人被殺害、羞辱、監禁，這對中國當然是很糟糕的事情。¹⁶

他的中國觀和其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也產生緩慢的質變，他最後將文革定義成「一場對於政策和權力的鬥爭，各方都堅信自己的方法最適合社會主義建設，而反對方的策略則會導致災難。」¹⁷

范乃思毋寧關注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¹⁸他的第三世界觀中，反映出其間的中國認識。范乃思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論北京的第三世界政策，認爲北京對於亞非拉國家捲入冷戰而與美、蘇的結盟相當憂慮，¹⁹因此需要和第三世界結盟以反制：

中國自 1949 年起的真正國家安全威脅幾乎完全來自超級強權，以及他們在鄰近第三世界國家的軍事干預。第一個威脅來自美國從韓戰時期到中美低

註 15 Peter Van Ness, "Mao Tse-tung and Revolutionary Self-Relianc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0, (January/April, 1971), p. 73.

註 16 *Ibid.*, p. 56.

註 17 Peter Van Ness and Satish Raichur, "Dilemma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Strategic Lines in China, 1949-1981," in Peter Van Ness ed., *Market Reforms in Socialist Societies* (Colorado: Boulder, 1989), pp. 151-152.

註 18 范乃思至少有三篇以中國的第三世界國家身分討論其角色之著作，分別爲 1974 年的"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1993 年的"China as a Third World State: Foreign Policy and 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和 1998 年的"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atterns of Engagement and Indifference"。

註 19 Peter Van Nes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Jae-Kyu Park and Melvin Gurtov eds., *Southeast Asia in Transition* (Seoul: Kyung Nam University Press,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1977), p. 109.

盪時期的威脅。接著，威脅來自於蘇聯，也許早至1964年赫魯雪夫就據信將對中國初生的核子設施進行政擊，直到今天蘇聯還是有這樣的企圖。^①

范乃思於是大異於美國主流的中國觀，反對將中國當成世界的主要威脅：

美、蘇的兩國政策都宣稱北京基於「和平共處五原則」願意和東南亞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作為是擴張主義的偽裝……有鑑於中國和1950與1960年代的美國、和現在的蘇聯天差地別的軍事力量，無可避免的必須提出一個疑問：到底是誰在威脅誰？^②

反帝期望落空促動范乃思從事反省，某種革命遭到背叛的感覺開始影響范乃思爾後的中國研究議程。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范乃思提到：

對海外的毛澤東思想者而言，這根本是和惡魔和談。^③

…於1968年幾乎控制了法國政府的學生們與世界上、西方國家、美國的毛澤東思想者，發現「我的天啊，我們以為他的想法是要製造革命、要帶來政治改革、要使世界變得更美好，但他卻和惡魔握手言和。」我的意思是這就像耶穌基督和惡魔會面、握手，所有的基督徒都會說：「oh my God。」^④

他一方面感到失望。另一方面想以現實主義為中國的「卸責」找尋合理解釋。范乃思認為中國欲與美國和解是為因應蘇聯的布日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面對蘇聯決定以武力干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並曾確實考慮攻擊中國的核子設施，已使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極大威脅，因此中國需要聯合美國來嚇阻蘇聯，^⑤中國的妥協算是迫於無奈。但是，從先前不畏兩大帝國主義強權，獨自對抗美帝及蘇修的中國，^⑥轉變成擱置理想的權力政治國家。

在四人幫倒臺後，中共採取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策略，這樣的策略無異坦承人類基本上是被物質利益所激勵，明顯的與毛澤東思想的「新人類」概念大相逕庭。不過遲

註① Peter Van Ness,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Current History* (Sept., 1974), pp. 106-109.

註② Peter Van Nes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Jae-Kyu Park and Melvin Gurtov eds., *Southeast Asia in Transition* (Seoul: Kyung Nam University Press,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1977), p. 114.

註③ Peter Van Ness,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atterns of Engagement and Indifferen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Westview, 1998), p. 156.

註④ Peter Van Ness, "Peter Van Ness Interview," 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網站訪談稿 (October, 19-20, 2009), <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02.php>, 頁 33。

註⑤ Peter Van Ness, "Three Line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1950-1983: The Development Imperative," in Dorothy J. Solinger ed., *Three Visions of Chinese Soci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pp. 133-154.

註⑥ Peter Van Ness, "Quarterly Chronicles: Sino-Soviet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6 (1966), pp. 174-176.

至 1998 年，范乃思如此發抒對自己遭到背叛的不滿，除了提到毛澤東與美和談背叛第三世界國家外，范乃思還提到：

在毛澤東於 1976 年過世後，鄧小平成為中國最有權勢的領導者，而中國又再一次的轉身不理第三世界國家……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似乎完全放棄第三世界的集體行動。儘管中國關於第三世界的辭令還在繼續播放，但鄧小平不再熱衷於和一無所有者建立同盟，而是藉由和國際現況和平共處的方式，試圖以最快的速度加入有權有勢者。^⑥

…中國和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一起競逐國際多邊機構和個別捐獻國家有限的補助款和貸款，因此中國的成功從某些角度來說犧牲了其他的第三世界國家。^⑦

據范乃思所述，在 1980 年代末起的一系列事情，讓他大大受到震撼：

我們過去對於資本帝國主義的看法是對的（即便我們傾向忽略共產黨也可能成為帝國主義者），但我們為社會正義而戰的同時，也被我們所反對的冷戰意識形態所蒙蔽。我們就如同詹森和其他的反共學者一樣，以過於簡化的「好人」、「壞人」來理解那個時候的國際政治。如果共產黨反對美國帝國主義這個壞人的話，那他們當然是好人。我認為這樣的觀點使我們在智識上無法理解毛澤東，特別是在他的晚期。也沒辦法理解後來的波布，和現在的鄧小平。^⑧

從此以後，范乃思開始關注人權議題，初始他從西方習以為常的人權論述出發，認為人權是普世價值，而文化相對論則是政府掩飾自己迫害人權的托辭，^⑨並據此嚴厲譴責北京。後來范乃思經過反省，同時檢視東西方政府的人權政策，小心不讓自己淪為某個立場的傳聲筒，^⑩後期他對人權的定義已能兼採中西之說。他認為使人免於飢

註⑥ Peter Van Ness,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atterns of Engagement and Indifferen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Westview, 1998), p. 156; 類似的論述亦可參閱 Peter Van Ness, "China as a Third World State: Foreign Policy and 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06–207.

註⑦ *Ibid.*, p. 164.

註⑧ Peter Van Ness, et al., "Who We Are in 1989: East Asi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1, No. 2 (1989), pp. 194–195.

註⑨ Peter Van Ness, "Introduction," in Peter Van Ness ed., *Debating Human Rights: Critical Essays from United States an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2.

註⑩ Peter Van Ness, "Introduction: Values, History, and Powe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7, No. 4 (1995), p. 5.

餓、疾病、文盲、折磨、未經程序正義的囚禁、殺害等同樣重要。^①范乃思認為可行的人權政策應建立在連貫性、互惠、負責三項基本原則上。^②他也運用這些原則和概念檢視所有國家的人權政策。范乃思除了撰寫了一系列關於人權的文章以外，更編輯了 *Debating Human Rights* 一書，希望不同的人權觀可以經過對話而各自提升。

范乃思一度對中國充滿憧憬，這樣的感情驅策他必須面對後來革命理念的流失。歷經中美和解、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范乃思對中國的認識一次次受到衝擊。而他追求正義的步伐，隨著與他共渡這段遭遇背叛歲月的夫人，選擇落腳澳洲，成為晚期他反抗霸權的基地。他的正義觀從反美帝，轉變成關注人權，後又擴及人類安全，開展出更周延的「國家行為準則」。21世紀伊始，他開始談論環境、經濟、公共衛生等新威脅，無不涉及人類安全。^③此刻對美國和現實主義者的批判，集中在美國對人類安全的威脅。相反地，他讚許中國的作法符合合作安全的準則。^④自美國發動反恐戰爭，范乃思全力抨擊布什主義與單邊主義。

澳洲似乎是一個更容易實踐他的正義之所在，因為澳洲的工黨領袖更願意採納范乃思所作的論述和建言，再加上澳洲相對自由的政治環境。使得他慢慢從美國學界退出，轉而投入澳洲學界。即便已經高齡 77 歲，范乃思至今仍不停地著作和組織工作坊，實踐他心中未完成的正義。

伍、王海的學思歷程與中國研究

王海 (Thomas Heberer) 的學術生涯在不斷追求中進行，最早雖曾於 1967 年應父親之期待進入法蘭克福大學就讀法律，後不顧反對在 1969 年決定轉向社會人類學與哲學。同年，他轉到哥廷根大學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繼續學習社會人類學、哲學以及政治學。適逢德國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促成王海轉赴緬因茲大學 (University of

註① Peter Van Ness, "Introduction," in Peter Van Ness ed., *Debating Human Rights: Critical Essays from United States an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16.

註② Consistency, Reciprocity, and Responsibility. 請參閱 Peter Van Ness, "Addressing the Human Rights Issu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9 (1996), pp. 329-330.

註③ 他在 "New Zealand: What is the Problem?" 一文中表現出對核子武器的戒慎恐懼，而防止核擴散議題也成為他日後文章的重心之一：Peter Van Ness "Globalisation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in Samuel S. Kim ed., *East Asia and Globalizatio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Peter Van Ness, et al., "Who We Are in 1989: East Asi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1, No. 2 (1989), p. 195.

註④ Peter Van Ness, "Designing a Mechanism for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sian Perspective*, Vol. 32, No. 4 (2008), p. 118; Peter Van Ness,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Four-Plus-Two-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in Mel Gurtov & Peter Van Ness eds., *Confronting the Bush Doctrine*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5), p. 264; Peter Van Ness, "Bush's Search for Absolute Securit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Mark Beeson ed., *Bush and Asia: America's Evolving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02-103; Peter Van Ness, "China's Response to the Bush Doctrine," *World Policy Journal* (winter, 2004), pp. 42-43.

Mainz) 與朋友組織集體宿舍，他們向當地中學生和學徒工宣講馬列主義，此外也繼續攻讀社會人類學，並在 1970 年轉向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由於當時緬因茲大學並無漢學系，1972 年又到海德堡大學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讀漢學，但有感海德堡漢學較為保守，便自己從香港訂教材，努力自學漢語兩年。後來王海再隨其導師轉到不萊梅大學 (University of Bremen) 寫博士論文，以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為課題，其中特別研究毛澤東的群眾路線。1977 年畢業以後，王海隨即加入西德共產聯盟，從事共產主義運動，並規畫到中國工作，以求了解中國情況。

王海受馬列思想影響頗大，曾深信馬列觀點完全正確，其中列寧論帝國主義的部分對王海影響較大，王海從書中的左派理論方面了解到不少東西，並且在 1968 年開始的學運中初探左派思想。如今回顧博士論文，當時認為是很科學的作品，實屬於意識形態的闡述。1968 年的學運影響王海思想形成。王海主動參與學運工作，在哥廷根大學與社會人類學的同學組成組織，就社會人類學史進行批判解構，他們循著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主義提出質疑，起先王海和同學們研究並批判某些著作，如 Wittfogel 的「東方專制主義」，之後進而批判起自己的教授：

我們質疑十九世紀還有二十世紀初期很多那個德國的社會人類學家他們的這個殖民主義的觀點，我們批評這個，另外一個方面還有他們的帝國主義……他（教授）有一個講座，關於那個塔斯馬利亞海島，他介紹塔斯馬利亞人的社會情況。我們問他為什麼沒有說塔斯馬尼亞人已經在一百多年前被幹掉了？^{註 5}

隨著運動開展，王海與其同學對教學上的不滿逐漸上升，之後更與同學們將研究所分割，一部分給學生，則教授不進去，另一部分給教授們，而學生也不允許進去。演變而來的是，所上沒有教授們上的課，只有學生們自己的課。逐漸地，王海認為這種上課方式不具意義。在緬因茲大學，學運的活動主要在校外，以集體宿舍方式，組織學生和學徒工從事大學外的政治活動。德國學生運動到後來分成幾個部分，有一部分是配合社會民主黨要長期進行政治活動，另一部分是依靠蘇聯的德國共產黨，再一部分是佔少數的恐怖分子，最後一部分則靠攏中國。

王海到中國的時候，發現中國通過文化大革命似乎找到一條不同路線，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看似較為良好。等日後王海在中國工作一段時間，又感覺中國也並非理想社會。他決定先透過歷史，分析中國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發展，且不一定要以馬列主義作分析。簡言之，他已經不再認為馬列主義史觀具有決定性，中國主要還是受到自身歷史脈絡的影響較大，他進而主張左派思想僅能作為學術研究的方法之一。

1975 年，王海隨著學校旅遊團首次來到中國，當時中國正處文化大革命期間。

註 5 王海 Thomas Heberer，口述歷史訪談，訪談者：洪雅筠，訪談地點：Duisburg 王海的家中與 University of Duisburg 王海的辦公室，2009 年 10 月 26、27 日 9：00。

1977年，王海前往北京在北京週報以外國專家身分任職。到了中國以後，果然發現新中國和過去在書面資料上的全然不同，令他感到驚訝。1978、79年因為友誼賓館的解禁，王海在關於德國的一場報告中認識了他的夫人——「王靜」，王海在中國待了四年直到1981年才離開，並取了現在的中文名字。1981年回到德國以後，他在德國各地為華人受害者擔任翻譯。從1983年到85年，王海在不萊梅海外博物館（亦可稱為民族博物館）成立中國館，管理許多明清時期及清代以後的歷史文物。為了撰寫教授論文，王海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中國六個城市作考察，以理解各個階層的個體經濟，通過挨家挨戶訪問個體戶，受訪者總共有一千五百多戶，共計三千多人。他還在同年採訪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藉此了解黨中央對個體經濟、私營企業之看法。在對於個體戶的追蹤研究中，王海在1987年再度回到那六個城市作追蹤，並完成教授論文。

王海在中國找尋大環境變遷之中的個體能動性，反映了他自己不斷追求突破的學思生涯。獲得教授資格後，王海在1993年到94年又和一位不萊梅大學地理學教授合作，費時六個月在中國七個省考察八個鄉鎮，所研究的範圍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教育與財政，這個課題專書於1998年並以德文出版，接著發表英文版本。他在1996年到97年進行另一個關於私營企業家的社會和政治作用的課題，王海以社會學的戰略群體理論，分析越南和中國企業家的問題。他為了這項研究，在中國三個省進行田野調查。1999年到2002年的主要研究課題乃關於知識分子其概念如何轉換成政治。2003年到04年和人民大學合作研究基層選舉。2008到09年則和杜賓根大學 Guenter Schubert 教授合作，研究關於農村縣和鄉鎮幹部之作用。

王海之專長在於社會人類學，因此對於少數民族特別感興趣，某次他在其北京服務單位圖書館翻找相關資料，雖然資料甚少，不過他仍歸納出幾個令其感興趣的少數民族，其中有彝族、佤族以及景頗族。王海首次進入到少數民族的世界，特別對彝族區感到興趣。他發現從五十年代以來，似乎沒有外人去過當地，遑論是作田野調查，加上當時尚未完全開放，因此當地大部分的居民沒有見過外國人。王海從資料中得知，當地還保留著薩滿教，不過中國官方不願面對這項現實。王海仍是提出要求採訪薩滿教，遭到中國方面陪同與翻譯的拒絕，³⁶不過其一如既往仍堅決採訪，後來中方勉強答應，安排兩位薩滿參與採訪。

王海認為民族企業家身分具有多重功能，不僅是經濟上的先鋒，亦是社會的承載體。企業家不僅為中國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企業家為政府在就業問題、供應問題提供解套，亦增加政府稅收，紓緩中國政府經濟壓力，這些應歸功於企業家所具備之道德觀，而這也是中國企業有別於西方之特色。民族企業家連繫著複雜的關係網絡，因此當企業家形成一種戰略群體後，其行動更具影響力。企業家為了將利益最大化，採取了有限逾矩的方式，並不挑戰與威脅政府的領導，但逐步使得政府做出退讓，制度

註³⁶ 當時中方人員見王海與其中國籍夫人說：「如果你是中國的朋友，就不要提出這個問題。」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上因此出現變革，此何以企業家在中國改革進程中的角色不容小覷。企業家為其利益所作的叛逆行爲，導致了經濟、社會與政治上之變革。政府一方面欲持續進行改革，以維持經濟繁榮；一方面又必須維持其政權合法性下所作之行爲，卻間接成爲建設公民社會之前提條件，從同意企業家入黨，到開放地方基層選舉，種種措施爲建設公民社會露出曙光。

王海除了關注企業家行爲外，更注意到處於弱勢的少數民族問題，及少數民族（彝族）企業家在改革進程中之影響。少數民族面臨現代化與傳統之間如何拿捏的困境，少數民族企業家如同當中之磨合劑。少數民族企業家所具備的雙重角色，不僅維持了傳統（家支觀念），更進而將之現代化，也就是將家支觀念用於企業的關係網絡中，體現出中國改革進程的另一面向。王海不贊成以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自由主義標準檢驗中國，認爲現在中國公民社會正在萌芽階段，未來將會出現具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如同彝族企業家所擁有的雙重身分，他們一方面象徵著族群，另一方面又代表著族群的現代性。

經過多年的歷練，王海對於中國已不再只是想像，而是更爲務實。王海以社會人類學理論進行研究，必須打入基層群體才能真正理解問題。王海不僅自身的研究強調田野調查，在其教學上亦是如此，其亦影響其他學者加入這種研究方式。王海所堅持的社會人類學與民族誌的研究方式，爲德國的中國學研究注入一道新血，其研究成果展現不同面向的中國意象，延續了下鄉的精神。

陸、李歐梵的學思歷程與中國研究

李歐梵是既身在中國之內，又身在中國之外，在文革之前已有認同歸屬，但又捲入文革而反思認同。他在 1939 年出生於河南，1949 年李歐梵來臺後即進入新竹師範附屬國小就讀，1957 年進入臺灣大學外文系就讀。他回憶說：「我的疏離感來自於那時候整個臺灣的文化環境，對於國民黨影響下的意識形態，我覺得煩悶。講不出來這是不是反抗？就是覺得這世界太小，這世界很土。」³⁷由於當時臺灣仍在戒嚴之下，讓李歐梵對威權統治模式下的箝制產生一種難以接受卻又無法抵抗的疏離感：

「…蔣總統的閱兵大典。我看到他紅光滿面，手一直敬禮，久久不停，我一方面覺得這個場面很偉大，一方面下意識裡存在不敢想的問題，覺得…很愚蠢，很笨。」³⁸

李歐梵從青年時期開始，內心就嚮往當個國際人。1962 年李歐梵前往美國留學，抱著成爲國際人的夢想，且認爲外交是一個很好的途徑，但他後來發現在外交完美形

註 37 李歐梵口述，陳建華訪錄，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6 年），頁 34。

註 38 同前註，頁 31。

象背後藏的竟是權力分配的現實問題：

「…Hans Morgenthau 有一天他在課上講到中國革命，講國共內戰那一部分，就把國民黨罵得一無是處…我不是反國民黨，而是覺得受了委屈，覺得自己當一個國民黨的外交官，實在沒有出息。你能做什麼呀！受人欺負嘛。有一次我和幾個學外交的歐洲學生辯論，他們都贊成中國加入聯合國，我不贊成，為國民黨辯護，可是辯不過。」³⁹

李歐梵因此陷入了個人的認同及存在危機，他不禁自問我來美國幹甚麼？我還要做什么外交官的美夢？如此一來更加深了李歐梵對前途的絕望感。1963年他決定轉往哈佛大學。六十年代末期，正適逢越南戰爭爆發。李歐梵認為嬉皮文化的興起是受到越戰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當時這些事情在美國學院中引起極大的狂熱，「反越戰」風潮更是直接牽連到海外中國學對中共的立場問題，有不少留學生在六十年代末期和美國反戰的激進學生一樣，開始認同中共的文化大革命。⁴⁰李歐梵參與了學生反越戰及反美帝國主義的運動，他說：

「…我教中國現代史，剛好講中國革命，所以學生們不分青紅皂白認為我是中國社會主義理想的代言人。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到最後我感覺到我自已有一種承擔的心態。我覺得在美國教中國史的人，有義務發言，似乎我的言論就代表了幾千萬的中國人一樣，我有義務為我的學生去遊行。」⁴¹

李歐梵看見中國人對毛澤東狂熱式的崇拜，但卻忍不住懷疑是否有一個領袖能如此偉大？至少他認為毛澤東並不懂外文，不可能成爲一個世界性的領袖。當時他認為所謂的知識分子應當像毛澤東說的跟人民大眾站在一起，要洗腦且要進行思想改造，但李歐梵覺得不應該把知識分子貶得一文不值。美國反戰情緒從舊金山、柏克萊開始演變成一個叫「Make love, not war!」的運動，但李歐梵對此卻產生一種疏離感。在對政治望之餘，李歐梵開始摸索一條自救之道，他希望能不以國家民族爲依歸去認同更深一層的中華文化，因爲他心目中的中國文化是廣泛無國界的，也應該是更兼容並蓄的。他更覺得不應該「非此即彼」、非親共就反共，所以提出認同危機的論點，並用留學生的身分認同問題來表現出「無根的一代」漂泊的情緒。李歐梵塑造一個懷抱「世界主義」的理想者，並將自己定位爲中西文化之間的中介者，但卻始終流露出一種邊緣者的漂泊感。⁴²

註³⁹ 同前註，頁60。

註⁴⁰ 李歐梵，「六十年代哈佛的學生生活—從反越戰到嬉皮」，《我的哈佛歲月》（臺北：二魚文化，2005年），頁107。

註⁴¹ 李歐梵，「六十年代哈佛的學生生活—從反越戰到嬉皮」，《我的哈佛歲月》（臺北：二魚文化，2005年），頁92。

註⁴² 李歐梵口述，陳建華訪錄，「前言」，《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頁28-29。

李歐梵除了專注於中國文學的研究之外，也致力於現代中國文化史的論評。他的書寫「從晚清的報紙雜誌到香港的電影工業，從三〇年代上海的頹廢美學到後天安門時期的文化批判皆有涉獵。」^④由此不難看出，李歐梵所涉獵的學問層面既廣，關懷也深。李歐梵常以「狐狸」自喻，特色便是涉獵廣博、相容並包，但卻不被任何的理論抓住，做學問時較注重在小的、輕的理論，注意細節的開展。「面對中國和美國大陸學界，都故意站在邊緣的地位」。^⑤他強調知識分子應該保持一種邊緣的地位和角色，和「中心」保持距離，而且對主流中心發揮予以批判的功能。^⑥李歐梵自幼成長於一個西方文化氛圍濃郁的家庭，因此他與中國古典文學之間其實有一段距離的。李歐梵為自己研究中國文學的立場提出三點歸類。第一個立場是提倡「古今不分」：^⑦

「探討新文學，我自己總是相信，任何一個文化，不管你從哪裡開始，都要探討它的源流、背景，他背後的东西。不管從哪裡開始，我都會越想越古，這樣就古今不分。」^⑧

基於這樣的立場，李歐梵認為中國現代文學不必分期，由於中國大陸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時，往往將時期分割開來。他們用年代區隔出近代、現代、當代和新時期，所謂的近代是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現代是從五四到一九四九年，當代是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新時期文學則是指從一九七八年到現在。^⑨

由上述可看出，李歐梵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應當是從晚明開始的，因為晚明所呈現出來的頹廢感，和他論述的「現代性」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對李歐梵而言，頹廢感是一種對時間與歷史的反思，對現代歷史洪流的倉促和破壞的反應：「即使歷史進步的事實無法被否認，但卻越來越多人懷著一種痛苦的失落與異化感覺來經驗進步的後果。」^⑩然而這種頹廢精神在五四新文化時期，被視為一種反面的教材，因為這和五四時期所揭示「破舊立新」的價值系統是完全不同的。李歐梵企圖透過反思現代性，重新考察大陸學界過去對五四新文學的定評，他對「頹廢」文學與文化的提出，的確在中國現代文學以「五四」為分水嶺的思想淵源外，提供我們一條新的理論線索，即一條異於五四傳統的文學史敘事。

註④ 同前註。

註⑤ 請參見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臺北：麥田，1996年），頁5。

註⑥ 陳建華，「前言」，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頁6。

註⑦ 李鳳亮，「民族話語的二元解讀——論李歐梵的文學現代性思想」，《文藝研究》，第6期（2006年），頁73。

註⑧ 李歐梵口述，陳建華訪錄，「現代與傳統」，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頁109。

註⑨ 同前註，頁109-110。

註⑩ 練碧生，「中國現代文學、文化中的頹廢和城市——評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文藝研究》，第8期（2005年），頁131。

第二個重要的立場是，從現代出發。李歐梵自覺沒有傳統的家學淵源，或者是詩詞歌賦、訓詁考證之學的訓練，受到西方理論有關文本和解釋的影響，因此他對於中國文學都是「從一個現代的立場出發，無所謂什麼傳統。」⁵⁰既然李歐梵是站在一個現代的立場去探討中國，也就表示他認為過去的一切都是需要靠後人去把它解釋出來，文學作品本身是靜默的，直到我們開始閱讀並試圖解釋它之後，文學作品才開始與我們產生對話。第三個立場是，「強調歷史文化語境中的文本分析。」⁵¹當李歐梵對於中國文學作一些解釋的時候，基本上是注重文本本身，但李歐梵並不把作品當成獨立存在的東西，他很注重將作品置入歷史脈絡中觀察，因為他覺得「作品是被製造出來的，它產生的歷史文化的環境，和它產生的人，和作家、閱讀者的關係都非常密切。」⁵²另外李歐梵也為現代文學提供了不少異於傳統的視域，例如，強調新時間觀念對現代性的影響、關注印刷文化對於現代性的意義、考察頹廢和現代性之間的關聯，這些都提供了我們一個異於五四傳統的座標和指引。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李歐梵的現代性情結有其歷史性，亦即處於一個全球化的後現代語境中，因此他對現代性的詮釋，也不可避免的帶有後現代文化烙印的痕跡。⁵³李歐梵首先從時間觀念入手，他認為中國現代性起源於一種新時間觀念的確立，也是一種直線前進的時間觀念，這種思考方式認為現在必定會比過去好，而將來也會比現在好。這是由西方的啓蒙傳統加上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化概念所衍生的意識，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上層知識分子對於時間的看法，從而發展出一種新的歷史觀，即進化和進步的觀念。李歐梵自言：

「我認為西方啓蒙思想對中國最大的衝擊是對時間觀念的改變，從古代的循環變成近代西方式的時間直接前進——從過去經由現在而走向未來，所以著眼點不在過去而在未來，從而對未來產生烏托邦式的憧憬。」⁵⁴

李歐梵認為這種烏托邦式的憧憬，在經過鴉片戰爭及其後幾十年屈辱感的推波助瀾下，致生成一種激進的歷史進化意識。這種激進的歷史觀將現在和過去、革新與守舊、進步與落後、傳統與現代完全的對立起來，並對傳統的一切展開批評，而最終的趨勢是知識分子的偏激化和全盤革命化，這也產生了一場影響深刻且長遠的社會主義

註⁵⁰ 李歐梵口述，陳建華訪錄，「現代與傳統」，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頁110-111。

註⁵¹ 李鳳亮，「民族話語的二元解讀——論李歐梵的文學現代性思想」，文藝研究，第6期（2006年），頁73。

註⁵² 李歐梵口述，陳建華訪錄，「現代與傳統」，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頁111。

註⁵³ 李鳳亮，「民族話語的二元解讀——論李歐梵的文學現代性思想」，文藝研究，第6期（2006年），頁74。

註⁵⁴ 安建清，「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空間體驗——兼與李歐梵先生商榷」，汕頭大學學報，第25卷第2期（2009年），頁5。

革命。

李歐梵認為五四的進步史觀問題重重，五四把西方的傳統引進中國後，太過樂觀，沒有把西方理論傳統裡面產生的懷疑也引進來。⁵⁵換言之，在引進西方社會進步史觀的同時，卻忽略了在樂觀主義背後伴生的「頹廢感」。但李歐梵的這個論點卻也引來不少批判的聲音，學者韓毓海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李歐梵的確替我們揭示了現代性頹廢和悲觀的這一面向，這也使我們對現代性有更全觀性的理解。但他欲批判的是李歐梵對於現代性頹廢這一面向偏頗性的讚賞態度，同時又企圖用這一面向壓抑和掩蓋革新與進步面向的現代性在歷史上的作用。⁵⁶然而李歐梵認為他對五四的建樹並非採取一個全然否定的態度，只是他認為這方面的研究的確有重新思考及反思的空間，甚至會覺得在左翼論者這樣的觀點背後是否也隱藏著對五四及左翼敘事的話語霸權以及他們欲宣示文化發言代表權的野心。

李歐梵在中國現代文學版圖中建構出一條頹廢文學史線索。⁵⁷雖然其志並不在於為頹廢文學翻案，而是希望藉此來矯正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線性敘述，重寫現代文學真相的種種擬態。⁵⁸為此，「他繞過了五四啟蒙主義，建構了始發於通商口岸的、從民族國家想像到城市——日常生活現代性想像的所謂中國「自發現代性」進程。」⁵⁹由此不難看出，多年來李歐梵一直在試圖「超越」大陸學術界掛帥的現實主義和革命主潮，⁶⁰他也戲稱自己是個愛唱「反調」的人，而他對浪漫和頹廢方面的偏重，以及對文學及文化史上現代性的探討，更是他具體反潮流的學術嘗試。李歐梵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推至一個左翼論者所無法收編的歷史源頭去，間接取回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言權。

柒、結 論

本文所比較的五位中國研究學者，雖然所屬知識社群彼此不同，在具體研究議程上各有千秋，但是都在生涯的較早期或生涯起步之際，共同目睹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他們分別以不同的程度觀察到其間的正面訊息，在學思上反應或開展了後續的研究。所以文革結束之後，一路進行到改革開放，他們在知識上如何因應，是關於中國研究知識史的重大議題，值得探究。共同的反應是，偏執與嘉許變成批評或中

註 55 李歐梵口述，陳建華訪錄，「現代與傳統」，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頁153。

註 56 韓毓海、曠新年，「一九八〇年代：歷史選擇與可能性」，文藝理論與批評，第1期（2004年）。

註 57 練暑生，「中國現代文學、文化中的頹廢和城市——評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文藝研究，第8期（2005年），頁132。

註 58 安建清，「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空間體驗——兼與李歐梵先生商榷」，汕頭大學學報，第25卷第2期（2009年），頁5。

註 59 練暑生，「中國現代文學、文化中的頹廢和城市——評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文藝研究，第8期（2005年），頁132。

註 60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臺北：麥田，1996年），頁4。

立，本文進一步紀錄他們的差異如何表現在學術上。

馬思樂與馬克林在文革前各已形成某種研究主體。前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執著早於文化大革命，取得學位反越戰的學潮之前若干年，視中國為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驗場所，關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可能性超過關切中國。馬克林來自世家，沒有反動的情感或遭到壓迫的焦慮，能維持研究立場超然，兼聽兼採，中國的存在看似遙遠，而即之也實際，總能將個體的情況與訴求，放進宏觀的歷史脈絡與整體的制度聯繫中分析，全面掌握的動機勝過片面解構的技巧。范乃思與王海均從六八學運中開展出以抵抗為主的學思起點。前者對中國寄予厚望，卻因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以降的一連串發展而失望，進而開展出一套全面批判的人權與人類安全視野，將中國與美國同時納為對象。王海則對漂泊的學術生涯安之若素，與中國的發展歷程相同的是他的理論取向，亦即從左派到務實，但他仍堅持要從邊疆民族的企業家群中，解讀出一個能改變國家政策的能動戰略主體。馬克林與王海不是身在帝國內部研究中國，沒有必須先掙脫才能感受解放的國際政治或資本主義右派視野，但馬思樂與范乃思則是在資本主義構成的主流視野下研究中國，除了麥卡錫主義的陰影，還有同儕的壓力。至於從帝國之外移民進入帝國之內，並從中國之外的主體位置轉而成為代表中國的革命位置的李歐梵，後來有意識選擇從某種想像的邊緣位置，來擺脫革命與帝國的對峙，建構多種通往世界主義的途徑。

表 2 激進年代學者在改革開放後面對中國的實例

空間 \ 時間	文革新前已具主體	文革中建立主體
身在帝國之內	馬思樂 馬列主義理論的潛能	范乃思 人權與人類安全的批判
身在帝國之外	馬克林 宏觀歷史與整體制度	王海 民族企業家動能與效能

研究中國必然受到研究對象的狀態所影響，也受到研究者的主體位置所制約，這是個知識論上的簡單常識，但是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的激進年代學者，則往往成為後人用來指陳政治介入學術的案例。本文除了透過文本分析與學思歷程的整理證實這樣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即使沒有採取從文化大革命的觀點進入中國研究，必須出於某種文革前既有的理論或社會位置，故即使是超然客觀的分析風格，也是嵌入在主觀意識的形塑過程中，故又不算真的超然。重點在於，中國研究對於研究者有什麼意義？達到什麼效果？是要開展馬克思主義，還是批判美國帝國主義？是要進出自如掌握整體中國，還是追蹤個體解放的蛛絲馬跡？激進年代研究者進入中國研究時有無主體性，或是否直接面對美國帝國主義介入研究議程，等等問題引導激進年代學者各自渴求能帶來某種特定效果的知識策略。當然，達到同一種效果的學術議程並不可能有一種，比如譚若思（Ross Terrill）早期親共而晚期轉而批評的論述，亦可同屬馬克林的整體中國視野，容或兩人取向迥異，又如傅禮門（Edward Friedman）早期憧憬革命而晚

期主張中國南北分裂以有利於民主發展的論述，可反射范乃思因懷疑中國悖離革命而生的反彈情結。但這些關於各種研究效果的追求，如何可以透過不同的研究議程獲致，已經是另一個研究課題了。

* * *

(收件：99年9月24日，接受：100年1月25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China Scholars of the Radical Years

—Meisner, Mackerras, Van Ness, Heberer, and Lee

Chih-Yu Shih

Professor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i-Tin Hsu

M.A.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ou-Tung Huang

M.A.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uo-Chih Liao

M.A.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Yu-Chun Chang

M.A.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Ya-Yun Hung

M.A.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adical years refer to the late 1960s and the early 1970s. China scholars going through the radical yea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ir career witnessed both the anti-war student movements in their society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selects five China scholars of the radical years to compare their strategy of adjust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to the year of reform and openness in China. They include Maurice Meisner who used to take on China as a site to develop Marxism, Colin Mackerras who has been able to remain detached in his macro-views of China, Peter Van Ness who felt betrayed by the Sino-US normaliz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in his pursuit of a just world without imperialism, Thomas Heberer who fulfills his quest for local agency for change by pragmatic field research that ends his Marxist idealism, and Leo

Lee whose diasporic identity replaced participation in the radical years by extricating transcendental globalism from those narratives considered socially rotte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lace and the time they conducted the China studies affect their strategies of adjustment.

Keywords: Maurice Meisner, Colin Mackerras, Peter Van Ness, Thomas Heberer, and Leo Lee

參考文獻

- Maurice Meisner 著，張寧、陳銘康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 Maurice Meisner 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Maurice Meisner 著，俞可平譯，「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193~205。
- 王海 Thomas Heberer，口述歷史訪談，訪談者：洪雅筠，訪談地點：Duisburg 王海的家中與 University of Duisburg 王海的辦公室，2009年10月26、27日9:00。
- 晏建清，「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空間體驗——兼與李歐梵先生商榷」，*汕頭大學學報*，第25卷第2期（2009年），頁5。
- 李鳳亮，「民族話語的二元解讀——論李歐梵的文學現代性思想」，*文藝研究*，第6期（2006年），頁73~74。
- 李歐梵，「六十年代哈佛的學生生活——從反越戰到嬉皮」，*我的哈佛歲月*（臺北：二魚文化，2005年），頁107。
-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臺北：麥田，1996年）。
- 李歐梵口述，陳建華訪錄，*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
- 練暑生，「中國現代文學、文化中的頹廢和城市——評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文藝研究*，第8期（2005年），頁131、132。
- 蕭延中、張慧才，「附錄4」，「傳說」中的傳說（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頁483~484。
- 韓毓海、曠新年，「一九八〇年代：歷史選擇與可能性」，*文藝理論與批評*，第1期（2004年）。
- Douglas, Allen, "Antiwar Asian Scholars and Vietnam/Indochina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1 (1989), pp. 112~131.
- Knight, Nick, "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 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Canberra: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7-22.
- Van Ness, Peter and Satish Raichur, "Dilemma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Strategic Lines in China, 1949-1981," in Peter Van Ness ed., *Market Reforms in Socialist Societies* (Colorado: Boulder, 1989), pp. 151~152.
- Van Ness, Peter, "Addressing the Human Rights Issu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9 (1996), pp. 309~331.
- Van Ness, Peter, "Bush's Search for Absolute Securit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Mark Beeson ed., *Bush and Asia: America's Evolving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02~103.

- Van Ness, Peter,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atterns of Engagement and Indifferen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Westview, 1998), p. 156, 164.
- Van Ness, Peter, "China as a Third World State: Foreign Policy and 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06-207.
- Van Ness, Pete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Bush Doctrine," *World Policy Journal* (winter 2004), pp. 38-47.
- Van Ness, Peter, "Designing a Mechanism for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sian Perspective*, Vol. 32, No. 4 (2008), pp. 107-126.
- Van Ness, Peter, "Globalisation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in Samuel S. Kim ed., *East Asia and Globalizatio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 Van Ness, Peter, "Introduction," in Peter Van Ness (ed.), *Debating Human Rights: Critical Essays from United States an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2, 16.
- Van Ness, Peter, "Introduction: Values, History, and Powe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7, No. 4 (1995), pp. 3-5.
- Van Ness, Peter, "Peter Van Ness Interview," 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網站訪談稿 (October, 19-20, 2009), <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02.php> °
- Van Ness, Peter, "Quarterly Chronicles: Sino-Soviet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6 (1966), pp. 174-176.
- Van Ness, Peter,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Four-Plus-Two-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in Mel Gurtov & Peter Van Ness eds., *Confronting the Bush Doctrine*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5), p. 264.
- Van Ness, Pe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Jae-Kyu Park and Melvin Gurtov (eds.), *Southeast Asia in Transition* (Seoul: Kyung Nam University Press,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1977), p. 109, 114.
- Van Ness, Peter, "Three Line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1950-1983: The Development Imperative," in Dorothy J. Solinger ed., *Three Visions of Chinese Soci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pp. 113-154.
- Van Ness, Peter, et al., "Who We Are in 1989: East Asi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1, No. 2 (1989), pp. 192-195.
- Van Ness, Peter,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Current History* (Sept., 1974), pp. 106-109.
- Van Ness, Peter,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atterns of Engagement and Indifferen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Westview, 1998), p. 156.
- Van Ness, Peter, "Mao Tse-tung and Revolutionary Self-Relianc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0 (January/April, 1971), pp. 68-74.